

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

程 应 镠

五胡十六国时期，封建割据的地方，有较大的发展。它沿用过去、特别是汉魏以来军事防御性的坞壁堡垒的形式，依山川形势以为固，或起城障相保聚，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有独立的生产和经济生活，俨然象一个小国家。它存在的时间很长，关系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很大。我国史学家，无论过去或现在，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不多的。陈寅恪先生昔年作《桃花源记旁证》，曾有所论述^[1]。其后，唐长孺先生在《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和《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两文中于有关坞壁的史料多所征引，对坞壁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估计^[2]。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提出了坞壁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并作了如下的论述：

……在战乱的情况下，劳动群众从坞壁多少得到可能有的保护，多少能够抵抗落后族的武装掳掠，应该说是含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割据。从十六国到隋的统一，这种割据形势总是存在着，并且基础巩固，成为北方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

本文拟就坞壁的发生与发展、坞壁和统一的关系、坞壁内部的阶级关系和生产状况等三个方面，因旧史之文，略加论释，阐明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其与时贤议论不同之处，非敢立异，只不过标明个人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点体会，或深或浅，是不敢自信的。

在汉代边塞上，障或烽台的外面，大都围上一层较薄的墙壁，象一座小城似的；这种东西叫做坞^[3]。堡也是一种小城。城本来就有自守的意义。壁的本义是墙垣，原为避风雨而设，后来才转为军事的用语。垒是军垒，防御的意思最为明显。

永嘉之乱，坞壁堡垒遍布于我国北部战乱地区，不仅用以防御落后族统治者的武装侵扰，而且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后来这些坞壁的故址，便以坞壁堡垒为名，如侯坞、赵氏坞、柏谷坞、铜壁、柴壁、成贰壁、乞活堡、裴氏堡、彭沛谷堡、吴深垒、苏康垒、徐嵩垒等。

南宋爱国史家胡三省注《通鉴》，对于这一时期的坞壁堡垒，一一为之注。《通鉴》永嘉四年郭默自为坞主条，《胡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其注裴氏堡曰：“永嘉之乱，裴氏举宗据险筑堡以自守，后人因而置戍，故堡就有裴氏之名。”张平据新兴、雁门等郡，垒壁三百余，夷夏十余万户，^[4]《胡注》曰：

“壁垒，盖时遇乱离，豪望自相保聚所筑者。”他注铜壁说：“河汾之间有铜川，其民遇乱，筑壁以自守，因曰铜壁。”注成武壁说：“成武，盖人姓名；关中大乱，立壁自保，因为地名。”陈寅恪先生论坞壁缘起，和胡三省相同，其言曰：“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当时中原避难之人民其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东北则托庇于慕容之政权，西北则归依于张轨之领域，南奔则侨寄于孙吴之故壤，……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5]

十六国时期，坞壁之所以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落后族的武装掳掠，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坞壁是生产和自保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结合却不能从“戎狄寇盗之难”中得到全面的解释^[6]。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中，当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瓦解之后，统治阶级为保持其利益便采取各种适合于当时情况的封建割据形式来实行其统治。坞壁是封建割据的一种形式，其基础是两汉以来逐渐形成的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和与这一所有制相适应的部曲、佃客占有制度，其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一部分则为血缘与地域混合起来的宗党观念。东汉末，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瓦解之后，四百年来，这种形式广泛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用以镇压农民的反抗和统治者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劳动者也利用这一形式来反对官府和豪强的压迫。

比较完备的坞壁组织，始于汉末。《三国志·魏志·田畴传》云：

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也。……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争讼之法，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

田畴的入居徐无山，是在东汉统一国家瓦解之后，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他所凭借的是宗族和“他附从”的力量。徐无山有险可据，有土地可耕种，经过了数年的经营，制订了法律，兴办了学校，建立了封建的秩序，而且有了独立的外交，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与田畴约略同时，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东汉地方豪强也聚宗族、部曲于本乡本土，和农民武装对抗。《三国志·魏志·李典传》：

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

又《许褚传》：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淮、汝、陈、梁间皆畏惮之。

从曹操统一北方直到西晋之末，这种坞壁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历史记载中，即不复见。有人把杜恕的营宜阳一泉坞和田畴在徐无山的事相类比^[7]，从政治上看，恐怕是不妥当的。杜恕在官场中失意了，暂时作退隐之计，因一泉坞垒壁之固，过一种庄园式的地主生活，在我国历史中，是直到解放之前还存在的。杜恕的营一泉坞和田畴入居徐无山不同。永嘉乱后，北方的坞壁，从政治上看，和杜恕的退隐就更不相同了。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地主过一种庄园式的生活，并不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坞壁却只是存在于统一国家瓦解，“戎狄寇盗之难”方炽和部曲、佃客占领制度以及宗党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时候。

西晋的统一国家在八王之乱中摇摇欲坠，和田畴相类似的坞聚，又见于历史的记载。

《晋书·庾袞传》说：

齐王冏之唱义也，张弘等肆掠于阳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尊亲，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袞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及贼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

庾袞保聚于禹山是在四世纪初。301年齐王冏出兵讨伐赵王伦，庾袞反对赵王伦的所谓僭窃，保聚禹山，洁身远祸。赵王伦失败了，齐王冏掌握了洛阳的政权，“逾年不朝”，庾袞说：“晋室卑矣，寇难方兴”，又带了妻儿跑到林虑山去，同样是洁身远祸。这也是在统一国家号令不行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一种表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保聚的组成人员为庾氏宗族和庶姓。庾氏为颍川世家，是当时士族的首领，南渡之后，庾家颇出了一些著名人物，如庾亮、庾冰、庾袞，论辈分都是庾袞的侄儿；因而禹山保聚的首领，便非庾袞莫属。庾袞之下，还有一些首领；这些人的身分也是很明显的，所谓“邑长”、“里贤”无疑地都是足以号令其部众的人物。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封建秩序，于是井然不乱，生产工作有了安排：“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保卫工作也有了布置：“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

对于田畴和庾袞，后人都有溢美之词。陶潜的《拟古诗》和《桃花源记》便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8]。当晋宋易代之际，渊明家国之感至深，既不能寄希望于未来，遂不禁流连于已往。假如我们今日对这种坞聚还认为它有什么淳朴太古之风，那便真如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庾袞在禹山的保聚，给了后来很大的影响。他不仅有行动，而且有理论。他作过《保聚图》，又作过《保聚全议二十篇》^[9]。《郡斋读书志》说他“西晋末保禹山，张泓（即张弘）、张昌不能犯，所全活者无虑数百万。”晁公武的话必有所据；虽然张昌不见得和庾袞发生过什么关系^[10]，其保聚方式、方法影响之大却由此可见。

西晋末，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也有过劳动者的坞壁屯聚。《晋书·张昌传》云：

太安二年，（张）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诸流人及避戍者多往从之。

昌乃易姓名为李辰，太守弓钦遣军就讨，辄为所破。昌徒众日多，来攻郡。

《读史方舆纪要》76说：“石岩山……有石岩耸立。”屯聚在石岩山，也就是据险自守。但入山的人们，其目的则在于避戍、避役。这就和田畴、庾袞不同，是人民对西晋暴政的一种反抗。《晋书》屡次说到流人为当地土民所侵苦^[11]，流人中绝大多数是劳动者，压迫他们的土民（或旧居民），是地方豪强和与豪强相勾结的长吏。避戍、避役的人们，其利害相同，命运相似。

张昌在石岩山的屯聚，后来发展成为席卷江、淮、湘、汉农民起义的大风暴，给了这些地区的统治者以重大的打击，对江东政权的建立，起了促进的作用。从303年张昌在义阳起

义，到305年陈敏割据江东，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重大调整。陈敏割据江东，固然是由于江东大族首领顾荣、周玘、甘卓之流在农民起义中骇破了胆，不得不暂时拥戴一个远比他们的出身、地位为低的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顾荣、贺循后来的拥奉司马睿，屈身于中原的高门世族，使北来政权得以在江东立足，也不能不说是这一次农民阶级反对西晋压迫的伟大搏斗的直接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自汉末以来，那种原来属于军事防御性的建筑，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割据的一种形式。这种地方割据，是在统一国家瓦解之后，在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形成的。田畴、庾袞的据险自守，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这是坞壁的一种类型。地方豪强，凭借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在农民战争中，组织反农民的武装，称霸一方，形成坞聚，李典、许褚是具有代表性的。这又是一种类型。这些都是统治者的坞壁。

张昌在石岩山的屯聚，是农民反对地主斗争的一种形式。这是劳动者的坞壁，是坞壁的另一类型。

对于这些坞壁的作用，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当时总的形势中去观察。把坞壁和总的政治经济形势分割开来，从历史发展中孤立起来，把田畴、庾袞、李典、许褚的坞壁一律看待，把这些坞壁和永嘉乱后的坞壁一律看待，把永嘉乱后到太和改革的坞壁和太和改革之后的坞壁一律看待，恐怕都是不恰当的。

永嘉乱后，坞壁遍布于北方战乱地区。汉族居民普遍地利用这一形式来反对落后族的侵扰与掠夺，首先出现的是与当地居民有联系的西晋官吏的坞聚。苏峻的结垒掖县，郗鉴的保固邹山^[12]，李矩、魏浚、魏该、郭默、张平、樊雅招合流人，因险设坞，和“戎狄”周旋^[13]，这是历史记载中营建堡坞的著名事例。当东晋建立之初，汉族坞壁，星罗棋布于河淮之间^[14]，阻止了胡骑南侵，给了司马氏从容立国的间隙，终致“士雅（祖逖）业迹中兴、克复九州之半”^[15]。当石勒强盛之时，苏峻、郗鉴相继南奔，李矩、魏该、郭默的武装力量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相继瓦解。但北方的坞壁，并没有因此而消灭。《通鉴》98永和五年（349）条：

（张）豺与太尉张举谋诛司空李农，举素与农善，密告之。农奔广宗，帅乞活数万家保上白。

《胡注》曰：“乞活，李恹、田徽之余众也，自永嘉以来，屯聚于上白。”广宗上白，后赵时，为建兴郡治所，是后赵统治的腹心之地。从306年起，这些乞活便屯聚于冀州^[16]。屯聚在上白的乞活首领李恹，313年为石勒所杀^[17]。从李恹被杀，到李农奔广宗，已经过了三十六年，上白的乞活，也已经长子育孙，但仍然保存着武装力量，为汉人首领李农所恃赖，

当后赵、前秦全盛之时，也还有坞壁始终保持独立，不受胡族国家的官号。《魏书·薛辩传》云：

薛辩……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疆遂总摄三营。善绥扶，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18]

薛强和王猛是同时人，《北史》说他“与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曾因王猛之介见过桓温。但当猛见任于苻坚之时，他却不与苻坚合作。薛强死后，他的儿子薛辩才受姚秦官号，为河北太守。姚兴从河东郡分置河北，只领一县，其辖区即薛氏的本乡^[19]。北魏时，河北郡有四个属县，其中包括了姚秦时的河北县^[20]。自永嘉之乱至北魏太和将近二百年，薛氏始终雄据本乡，其前半期（约七十年）完全为一独立国家，其后半期先后受姚秦、北魏官号，仍然保持

在本乡的统治地位。

象汾阴薛氏这样的“聚其族党，阻河自固”，不受非汉族国家官号的事例，可能是个别的。但和非汉族国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实际上割据地方，与胡族统治者相抗击的坞壁却是大量存在的。

当后赵乱亡之际，“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四万，以应（司马）勋”^[21]，司马勋是当时东晋的梁州刺史。张平据并州，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既“投款建邨”，“结援苻坚”，又向慕容氏遣使称臣^[22]，他所依靠的是并州坞壁的力量。

苻坚败亡，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三辅堡壁却以兵粮资助苻氏的政权^[23]。苻丕在晋阳仓皇立国，他的左丞相王永徽告州郡，还寄希望于垒主、乡豪，号召他们起兵，为国家尽力，承徽起兵的六人中，只王敏一人有官号，其他都是坞壁主帅，所以后来都拜为将军、郡守，享列侯之封^[24]。

慕容氏于东方复国，吴深、王祖、张申、蔡匡、齐涉、王敏、许谦、翟畅和贾鲍都凭借地方力量，和后燕对抗，杀太守，招引外援。后燕剪除吴深，从386年冬到389年夏，整整过了两年半的时间^[25]。

北魏统一中原，受到汉族和与汉族杂居的各族人民的剧烈反抗。自386年至490年的一百年中，反抗见于记载的约七十次。其前期如卢溥、仇儒、傅世都是地方豪望和当地居民相结聚抵抗了拓跋部的野蛮掠夺的。《魏书·长孙肥传》称：

时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推群盗赵准为主，……聚党二千余人，据关城，连引丁零，杀害长吏，扇动常山、巨鹿、广平诸郡。

卢溥原以大族领袖附魏为河间太守，后来却“帅其部曲数千家就食渔阳，遂据有数郡”，与魏对抗^[26]。清河太守傅世，“聚党千余家”，反对拓跋氏^[27]，大概和仇儒一样也是“不乐内徙”的。

拓跋部前期的徙民政策，不仅遭到汉族坞壁的反抗，也为当时已经汉化了的其他各族居民所反对，乌桓、丁零和西河、离石诸杂胡反内徙的斗争是史不绝书的^[28]。

444年，保聚河东已逾百年的薛氏对拓跋部也作着武装的斗争。《宋书·薛安都传》说：

元嘉二十一年，索虏主拓跋焘击芮芮，大败。（薛）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永宗营汾曲，安都袭得弘农。会北地人盖吴起兵，遂连衡助应。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进击盖吴。安都料众寡不敌，率壮士辛灵度等弃弘农归国。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时，河东地方势力对拓跋部在政治上的态度是不同的，薛氏同姓中所持的政治立场亦不相同。在薛氏和拓跋部这一场武装斗争中，和薛安都同族的薛拔，即“纠合宗乡，壁于河济”，站在拓跋部一边，切断薛永宗和盖吴的通路^[29]。当薛永宗进袭闻喜，“县无兵仗，令忧惶无计”，县人裴骏也“帅厉乡豪”把薛永宗打退了^[30]。这一方面因为北魏的统治者已学习得多了一些，懂得怎样利用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这时，无论从北方总的情况或是某一地区的情况看，民族矛盾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坞壁内部以及坞壁与坞壁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百余年来，宗党这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掩盖不了坞壁统治残酷的事实了。

反对拓跋部迁徙政策的斗争，逐渐转变成为广大的各族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拓跋部在这一斗争形势下，被迫进一步实行汉化。这，也就便利了她重建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永嘉以来，在剧烈的民族斗争中所形成的坞壁力量，虽然在旧史中，也还保持了当时渴望安宁和秩序的人们对它的正当谴责。《北史·宋世良传》说：

后拜清河太守。……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晋会稽，不历成公曲堤。

这是六世纪初的事。比这略早，“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衡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鬻军，逐为遁逃之藪，公私成患。”^[31]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对这些坞壁主展开政治和经济的斗争^[32]，其具体内容是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使三长俱隶于州郡。削弱了宗主在政治上的势力，那就意味着扩大了拓跋君主对于民户的占有，增强了统一的力量。此后，这个存在了将近二百年的地方坞壁势力，在某一时期，虽也曾起过保卫地方的作用，如《简编》所说^[33]，但总的说来，却成为统一国家的赘疣，故宋孝王在《关东风俗传》中慨乎言之^[34]：

文宣之代，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部，大族翊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

永嘉乱后，坞壁遍布于北方，虽经石勒、苻坚的统一，其势不衰。北魏统一中原，所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仍然是这一种地方的坞壁势力。这一时期，是坞壁发展的极盛时期；倘从政治上加以考察，它和田畴、庾袞所营建的坞聚是有区别的。这就正如胡三省和陈寅恪先生所说，是由于“戎狄寇盗之难”这一个因素的存在，是由于民族矛盾起着经常的主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包含着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文化的斗争，是落后的和先进的斗争，汉族的坞壁无疑地是代表了先进那一面的。

坞壁是阻碍了胡族的统一的。一般说来，坞壁是统一政权破坏后的产物，也是破坏统一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一般说来，统一是进步的。秦始皇开始建立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对于秦以前一个时代的诸侯割据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进步。秦以后，我国历史上每一次的统一，随着来的便是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巨大发展，是国家的昌盛，社会的繁荣。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封建割据的地方势力——坞壁却代表着进步的方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个问题。

二

曹操在统一战争中，消灭了地方割据的坞壁。田畴在曹操平定三郡乌桓之后，不得不“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35]，结束了那个小王国。李典、许褚在军阀混战中便和曹操的武装力量合流，成为这个力量的组成部分。李典后来也自请徙居魏郡，徙去的部曲、宗族至一万二千余口^[36]。

曹操统一北方，不单纯凭藉武力，象石勒、苻坚以至北魏的前期那样。相反，与其说是武力，毋宁说是政治上的优势。他在政治上开拓了一个新局面，裁抑了东汉以来的士族、豪强，又利用了他们的才智；在思想上一反东汉末的烦琐、空虚、浮华，重法术，尚通脱，崇实学，励节俭，象一阵清风，吹散了满天烟雾。至于兴立屯田，变荒原为绿洲，把统治安置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上，更是当时和他争雄的人们所不及的。

这一统一，给了北方以经济的恢复，生活的安宁，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石勒、苻坚的统一，和曹操的统一并不相同。他们所凭借的主要是羯族和氏族的武装力量。

石勒一生，其主要精力，都用在攻灭以坞壁为基础的各种武装集团^[37]。他对待这些被攻灭的武装力量，非常残酷。对徐龛，是“坑其降卒三千”；对曹嶷，是“坑其众三万”；对于李暉的上白之众，本来也是要坑杀的，只因其中有他的故人郭敬在，这些人才得到赦免配郭敬为兵^[38]。人们都说他和汉族地主、士大夫合作得很好，往往举张宾之被重用作例证。这当然是事实，但这只不过是事实的一面。就以这一面来说，他立太学、四门学、郡国学，而《晋书·苻坚载记》却说“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韦逞的母亲宋氏，在苻坚时以传《周官音义》封为宣文君的，在石氏统治之时，却流落冀州，依托于胶东富人程安寿，“昼则樵采，夜则教逞”，默默而无闻^[39]！他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40]但樊坦从参军升任章武内史，被他召见时，却一身褴褛，也不禁使他吃了一惊，对樊坦说：“樊参军，何贫之甚也！”樊坦答复得很率直，很气忿：“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41]樊坦说的是实情。重要的是有着这种实情的，不只樊坦一人。

作为一个君主来说，石勒在胡族君主中还是比较好的。石勒的统治，是羯族对其他各族的统治，其中，主要是对汉族的统治。其“号胡为国人”，胡指的便是羯族。其后，秃发氏、拓跋氏都自称为国人。在当时情况下，国人比汉人是落后得多的。落后的处于统治地位，历史于是乎便以螺旋式而前进。国人的统治，主要是军事的控御，是对生产与文化的摧毁。在汉族统治者极端腐朽的情况下，胡族因时而起，其兴也勃焉，石勒在北方，铁骑所至，似乎是无坚不摧；但真正强大的力量，是在于广大的代表了当时进步经济文化力量的汉族人民，故其统治终不免于一触即溃，而亡也忽焉。这种进步的经济文化力量，在北方，便是遍布于各地的坞壁。

继石氏而起的是苻坚在北方的统一。苻坚比起石勒来，接受了更多的胡族统治经验与教训。他灭前燕以及对东方的统治，在政治方略上，主要决定于王猛。王猛是当时最懂得政治的一人。桓温入关，王猛巾褐见之，桓温对他的评语是：“江东无卿比也！”他又问王猛：“秦国定多奇士，如生辈尚有几入？”王猛当时推荐了一个薛强，说薛强是“可与拨乱济时”的人物^[42]。他们知道，薛强保聚河东，和胡族统治者是始终不合作的。正确地处理非汉族国家和坞壁的关系，有赖于正确地认识汉、胡之间的矛盾；这是牵涉到当时胡族立国的根本问题的。王猛很了解这一点。苻坚平定了东方，在历史纪载上，我们看不见地方坞壁的反抗，这是和他任用王猛分不开的。《晋书·王猛传》说：

猛之未至邺也，劫盗公行。及猛之至，远近帖然，燕人安之。……坚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俊，以补关东守宰，授讫言台除正。

王猛临终，对苻坚说：“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但苻坚在王猛死后，执行了一个和这相反的方针，终于遭致了淝水之败。

淝水战后，东晋刘牢之进屯郾城，“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43]经过了七十多年，中原民心，依然未忘晋室。苻坚的大举南侵，真可说是政治上没有远见。北方坞壁和东晋在政治上的联系，只有最熟悉当时历史和正确理解坞壁和非汉族政权关系的大政治家如王猛者才能默而识之^[44]！

王猛死后不久，苻坚“分三原、九嵎、武都、汧、雍氏十五万户”镇守四方^[45]，是托命

于种人的武装镇压，和在其前的石勒、石虎，其后的秃发氏以及拓跋部统治前期没有什么两样。虽然苻坚和石勒在文治方面有所不同，在关中、他的根在所在，也还有过一些善政，但在前秦统治下，汉族和氏族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46]。

北魏统一中原，大批的汉族士大夫被任用了。但直到延和之初（432）还多属遇遣^[47]，《魏书·仇洛齐传》还说当拓跋焘统治之初“东方罕有仕者”。崔浩是被重用过的，然终不免于一死，而且株连甚众，“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旧史对这一件公案，记载得本不相同^[48]，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便是他遭了“北人”（《胡注》曰：“北人，谓其先世从拓跋氏来自北荒者。”）之忌，死在拓跋部民族统治的血泊之中。崔浩主张恢复五等封建制，“荐用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显然是代表了当时地方割据势力的利益的^[49]。崔浩之死，是北方坞壁和拓跋部的斗争的一种表现。北魏初期对待坞壁的政策和十六国君主基本相同，是在消灭不了的情况下，承认它在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某些特权；赖以维持其统治的是以拓跋部为首的国人的武力，《魏书·崔浩传》说得最明白不过了：

“神瑞二年（415），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太宗深然之。”

这种情况，直到孝文帝太和改制，才有了改变，有了和石勒、苻坚的根本的不同。孝文帝用三长法和均田制把广大的无主荒地和流散人户直接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样，他才战胜了拓跋部的贵族奴隶主，也战胜了坞壁主。北魏把统治中枢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洛阳，从某一种意义说来，是当时进步的经济与文化的象征。

太和改革终于完成了北魏的统一，这是鲜卑拓跋部汉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

坞壁对胡族统治者的斗争，客观上促使了胡族的汉化。

五胡十六国一些较小的国家，军事统治亦至为明显。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序有云：

……姚萇以马牧起事，故崇镇堡之势，以敌方州；赫连以统万建基，故芟郡县之名，尽归城主。

镇、堡和城是军事统治的中心或据点，镇户、堡户和城户即以军领民的制度最好的说明^[50]。《载记》说姚萇和苻登相攻，拉锯式地搞了好几年，那些忠心于姚萇的将领，一方面跟着姚萇打仗，另一方面“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51]。这又说明打仗的是一批人，搞生产的是另一批。《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说：

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其将输勿崙进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

然宁居乐土，非貽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宜置晋人于诸城（《通鉴》作“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

输勿崙的建议，实当时非汉族国家颇为普遍地实行了的办法。国人打仗，汉民生产，国人对

汉民实行军事的统治。胡汉之分，象泾浊渭清那样截然而不可混淆。所谓以军领民，如前所说，是非汉族对汉族的军事统治。这不仅是阶级压迫，更主要的还是民族压迫。有人认为这种以军领民的制度，和堡坞豪帅的占有部曲相同，恐怕是知其一不知其二^[52]。

永嘉乱后，中原文化之区沦为“戎狄”之域，坞壁得以普遍发展和长期存在，终于“用夏变夷”，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也非一二伟大人物之力。其关键在于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胡汉在经济文化上的重大差别，为非汉族国家是植基于军事征服与镇压之上的民族统治。坞壁对非汉族国家的统一是一种经常的破坏的力量，自永嘉之乱到北魏改革，对于保卫先进的经济与文化，对于促进各族特别是拓跋部的汉化，是起了作用的。

三

关于坞壁内部情况，较早的材料如田畴之于徐无山，庾袞之于禹山，范长生之于青城山^[53]，都有较完备而具体的纪载。永嘉乱后，北方的坞壁，象这样完备而具体的纪载，却不见于旧史之文。兹掇集有关史料，藉以说明这一时期坞壁内部的生产情况和阶级关系和过去大体相同。敦煌石室本《晋纪》云^[54]：

永嘉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

这一条纪载所说的堡壁大帅，便是李矩、魏浚一类人物。《晋书·邵续传》说邵续为曹嶷所困，嶷破其屯田，抄其户口。邵续当时绥怀流散，把流民安置在无主的土地上，亦耕亦战，屯田是最适当的一种生产与自保相结合的方式。《晋书》说李矩“阻水筑垒，且耕且守”，也很可能是一种屯田^[55]。据《晋书·食货志》，西晋最低一级的官员可占有衣食客一人，佃客一户，《晋纪》所说的四、五千家以至五百家的家中，当然也包括这种佃客和衣食客在内。

《魏书·卢玄传》云：

初，玄从祖兄溥，慕容宝之末，总摄乡部，屯于海滨。

同书《刘芳传》称：

及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责（刘）廞而诛之。子鸞，……率勒乡部赴兖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刘）粹，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鹄，谋应关西。

卢氏为冀州豪望，刘氏是徐方华族，他们都拥有乡部。乡部中包括了私兵、部曲和以宗党关系结合起来的义从。前者有时称为私属，如冯道根在齐明帝时便以私属从军，后来又率领乡人归附梁武帝（《南史·冯道根传》）。以宗党关系结合起来的义从，其中有地主，也有农民。这一时期坞壁的特点，即在以军事方式部勒其坞壁内部的居民。所谓乡部，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便担负起保卫坞壁的职责，或如卢溥、刘鸞、刘粹率领了他们从事于反对拓跋氏和高欢的斗争。

《魏书·段霸传》说霸父段乾在道武帝时“率乡部归化云中”，当拓跋氏初入中原，汉族豪望率户若干，率家若干归附拓跋氏之文亦屡见。乡部是举家、户而通言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部曲从事生产之例甚多，《梁书·张孝秀传》云：

张孝秀，……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远近归慕，赴之如市。

《南史·鲁悉达传》云：

“鲁悉达，侯景之乱，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为尤多。”

这种情况，在北方当亦不能例外。

北方坞壁内部的阶级关系仍然是地主和佃客、部曲的对立，另外，还有一部分奴婢。^[56]

苻坚为慕容冲所困，关中“千里无烟”，但三辅堡壁还以兵粮助坚。虽在战乱，坞壁生产还是继续着的。《通鉴》说慕容温在中山，“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郡县壁垒争送军粮，仓库充溢。”^[57]军事行动结束，生产也就立即恢复。但在胡族统治者混战下，生产有时几乎完全停止。后赵之末，冉闵和羯、羌相攻，“诸夏纷乱，无复农者”^[58]。在这种情况下，坞壁便如黑夜群星，那些已经沦为部曲、奴婢的劳动者，便默默地在坞壁保护中从事于神圣的生产劳动。可是历史记载，对此却晦而不显。

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于武定天保之际（543—559）著《齐民要术》一书^[59]，总结了当时中国北方的生产经验。王仲荦先生从生产规模、耕作方法、生产关系、粮食的大量买卖等几个方面论证了“与其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均田制经济的生产水平，毋宁说它更多地反映了当时作为封建社会主导经济结构——世家大族地主庄园经济的生产水平”^[60]。这里所说的世家大族地主庄园经济，即十六国以来的坞壁经济。这种经济《颜氏家训》也曾有过描绘，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治家篇》说：

生民之术，要当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埽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从吃、穿直到家庭日用，都是庄园自己的生产，只有盐须外来的供给。照颜之推的说法，这庄园主人，土地不可占得太多，“良田十顷”足矣；奴婢也不可太多，二十口之家，二十人亦足矣。这是他在《止足篇》中表示的意见。不止不足者，当然所占有的土地和奴婢便不只此数了。

但我们要着重说明的，并不是这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永嘉乱后，汉族先进的生产事业被坞壁保持下来了。个人常以为对北魏的均田制，从生产方面估计得过高，恐怕不合乎事实。《齐民要术》所总结的生产经验，实标志着坞壁生产的水平，而不是均田制度下生产的水平。在十六国时期汉族人民普遍被掠夺和生产被破坏的情况下，历史在逆流中迂回向前；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准备着物质和精神的条件的，便是这一时期的坞壁。

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说：

极其相似的事件，如果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情况^[61]。

这一时期的坞壁以及和坞壁相联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诸特殊形态，都必须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来进行研究，否则，对这些现象的理解，便必流于象马克思所说的：

这种理解的最好的美德就在于它的超历史性^[62]。

注：

〔1〕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2〕 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

〔3〕 见劳干：《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

- [4] 《通鉴》一〇〇。
- [5] 同[1]
- [6] 南宋叶适有堡坞议，但终不能行。
- [7] 见刘毓璜：《论汉晋南朝的封建庄园制度》，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 [8] 陶潜：《拟古》第二首。
- [9] 《郡斋读书志》卷十四，长沙王氏刊本。
- [10] 张昌于三〇三年屯聚于安陆，庾袞于前一年即避居林虑山。
- [11] 见《晋书》《王澄传》、《王弥传》、《杜弢传》。
- [12] 《晋书》《郗鉴传》、《苏峻传》。
- [13] 《晋书》六十三，《通鉴》九十。
- [14] 《晋书》六十二。
- [15] 《晋书·祖逖传·传论》。
- [16] 《晋书》五十九、一〇一。
- [17] 《通鉴》八十八。
- [18] 薛氏为蜀族，此时已完全汉化。
- [19] 《十六国疆域志》五，河北郡条。
- [20] 《魏书·地形志》。
- [21] 《晋书》三十七。
- [22] 《晋书》一一〇。
- [23] 《通鉴》一〇六。
- [24] 同上。
- [25] 《通鉴》一〇六、一〇七。
- [26] 《通鉴》一一一。
- [27] 《魏书》二。
- [28] 《魏书》二、三、四；《通鉴》一一一。
- [29] 《魏书》四十二；《通鉴》一二四。
- [30] 《通鉴》一二四。
- [31] 《北史》三十三；《魏书》五十三。
- [32] 坞壁主即宗主。《北史》三十三《李灵传》：“（李）悦祖弟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
- [33]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五〇〇页。
- [34] 《通典》三《乡党》引。
- [35] 《三国志·田畴传》。
- [36] 《三国志·李典传》。
- [37] 石勒所攻灭的武装集团为刘演、刘惔、王浚、邵续、徐龛和曹嶷，从攻灭刘演，到曹嶷败亡，恰好经过十年（313—323）。这些武装集团，实际都是坞壁的联合。读《晋书》有关诸传及载记可知。
- [38] 《晋书·石勒载记》。
- [39] 《晋书》九十六。
- [40] 《晋书·石勒载记》下。
- [41] 同[40]。
- [42] 《北史》三十六。
- [43] 《晋书》八十四。
- [44] 《晋书》一一四。
- [45] 《通鉴》一〇四，《晋书》一一三。
- [46] 周虓被俘，屡次谋叛，他自明本志，说是愿“生为晋臣，死为晋鬼。”见《晋书·

周虓传》。王猛死，其子皮谋反，苻坚问反状，皮说：“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贫贱，故欲图富贵耳。”苻坚对皮说：“丞相临终托卿，以十具牛为治田之资，未尝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在封建社会中，父亲功参佐命，儿子不免于贫贱，是违背常例的。这两件事，也可用来说明在前秦统治下，汉族统治阶级也是受到了和氏族不同的待遇的。

〔47〕《魏书》四上。

〔48〕参看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三七九至三八三页。

〔49〕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四七〇、四七一页，《通鉴》一二五。

〔50〕《晋书》一一九，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六五至一六六页。

〔51〕《晋书》一一一六。

〔52〕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六五至一六六页。

〔53〕《通鉴》八五；《华阳国志》卷八、卷九。

〔54〕见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

〔55〕《晋书》六十三。

〔56〕《魏书》七十六《张烈传》说：“于时议者以烈家产畜殖，僮客甚多，虑其怨望，不宜为本州。”北魏均田制规定奴婢受田。《颜氏家训》卷下《止足篇》谓：“常以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均可作为佐证。

〔57〕《通鉴》一〇六。

〔58〕《晋书》一〇七。

〔59〕吴承仕《经籍旧闻叙录》，转引自吴晗《灯下集》。

〔60〕见王仲荦《有关〈齐民要术〉的几个问题》，载《文史哲》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61〕〔62〕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二二六页。李雄在蜀，史称：“……宽和政役，远至邈安，……至乃闾门不闭，路不拾遗。”（《华阳国志》九）李雄和范长生的合作，实际上是对坞壁主的妥协，是保持部曲占有制度使之不受侵犯。当还没有更合理的封建生产秩序来替代这个部曲、佃客占领制度时，保持这个制度，使当地生产得以正常进行，也许是合理的。

斯 诺 痛 悼 鲁 迅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他同鲁迅的友谊，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鲁迅先生逝世，他敬挽一联，以示痛悼：

鲁迅先生不死

译书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姚 莘 农 敬挽
Edgal Snow

同在挽联上具名的姚莘农（姚克），当时正协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一书。斯诺为该书翻译鲁迅作品，请姚克介绍，始与鲁迅交往，得到鲁迅的帮助。他选译了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离婚》等七篇作品，加上《鲁迅的生平》，辑成是书的第一部分。该书于一九三六年末，由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其时鲁迅已去世。

鲁迅与斯诺先后作古，而两人铸成的友谊，将为中美两国人民永志不忘！

（晓 东）